

## 新观察

## 历史叙事的“个人化”与现代性

□傅逸尘

“在当下的很多战争叙事中，我们读到的是越来越普遍的对世界的简化。事实上，文学应该是反抗简化和遗忘的，它的使命是照亮、守护生活世界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处在战争历史进程中的人们，除了那奋不顾身的生死一击，是否还有其他存在的方式和命运的安排？”

以“新高地”这一关键词来标示新时代军旅文学，首先是基于新的时间、空间坐标下，军旅文学在思想观念、写作伦理、作家主体等方面的新变化、新面相。进入新时代，伴随着学生生态、创作主体、接受评价、审美经验的全方位嬗变，军旅文学新的表现方式与叙事空间在哪里？这是一个困扰着作家、批评家的迫切而重要的课题，也积蓄着军旅文学变革前行的力量。作为一种直面与回应，笔者策划主编了“新高地军旅文学丛书”，试图探索宏大历史背景下的“个人化”叙事，强调叙事中的“个人化”想象，以期拓展和丰富军旅文学的表现空间、叙事向度、话语方式以及美学风格。这种“个人化”想象，不同于90年代的“私人化”叙事，凸显的是以往英雄与传奇话语的背面，即更多地还原和展现“历史化”大叙事阴影下个体生命的存在与命运。丛书第一辑的4部长篇小说（张庆国的《老鹰之歌》、何鸿的《大西迁》、傅汝新的《一塘莲》、窦棕的《全面击溃》）已由花城出版社出版。

早在2006年，花城出版社就曾推出过“木棉红”长篇小说丛书，囊括了原广州军区12位专业作家的12部军旅长篇小说，在军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15个年头倏忽而逝，现如今，曾经的部队专业文艺创作室已经变换了存在和运行的方式，军旅专业作家群体也已经风流云散。改革强军的进程中，军旅文学正在经历低潮和阵痛，期待着换羽重生，重整旗鼓。在这样的情势和背景下，花城出版社推出了“新高地军旅文学丛书”，试图掀起和引领新时代军旅文学的又一波浪潮。“新高地”这个丛书名，寄寓了编者对新观念与新方法的认同与自觉，希冀着新时代军旅文学能呈现新的文学风景，攀上新的文学高度。

检视当下的军旅小说创作，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看，战争历史题材仍然占据主流。在“新历史主义”思潮的持续影响下，战争历史题材小说创作与十七年“红色经典”所建构起的文学传统越发疏离，有的甚至颠覆并解构了“红色经典”所描述的正规的、单向度的革命历史以及二元对立的意识形态立场，创作主体开始有意识地对战争情境中人性的复杂性、偶然性等因素进行探索性开掘，为以往单向度的革命历史增添了某种新鲜的视角和发现——已经“历史化”了的革命历史遭遇了来自文学的重构或重新阐释。

从文学的角度论，宏大叙事当然是历史叙事的主流或主导，主导着社会思想和时代精神，并产生过许多经典的史诗性巨著。这些名著之所以成为经典，恰恰在于作品没有忽略那些普通人的个体生命存在，在于以细节的形式保留了大量战争中的日常生活经验，这使得宏阔诡谲的历史叙事有了可触摸、可感知的血肉。“红色经典”中的军旅题材长篇小说，何以至今仍为广大读者所青睐，也是因为作品中大量真实的生活细节。这些细节是历史的源头，丰富而真实；是积土与跬步，后来的高山与千里都来源于它们。也就是说，那些细水与沙粒可能更接近历史本相，或者说就是历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中国革命历史尚未成为巨大的洪流时，或者已经成为巨大的洪流时，人的复杂性与历史的偶然性在革命历史的整体中都应该是巨

大的存在，构成了革命历史的最初底色，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革命历史的进程与走向。时移世易，当时代的洪流逐渐退去，最终留下的是坚硬骨感的巨石，而那些富于生命温度和生活情态的细水与沙粒，则早已消弭无踪。叙述或言说历史真实，作家首先要对“历史化”进行一番祛魅，过程中可能会发现诸多断裂与缝隙。这恰恰为那些试图探寻历史本相的严肃作家们提供了打捞历史丰富存在、发挥“个人化”想象的叙事空间。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史诗性的宏阔辽远令人着迷，从那种完整的线性历史和时间框架中更是可以得出一种清晰明确的价值判断，可以轻易地厘清庸常凡俗与伟岸壮丽的界限，从而得到对英雄精神的尊崇。而那些渺小的个人经验、那些微不足道的个人记忆，只有被贴上巨大的历史标签或成为特殊的新闻事件之后，才能被关注而获得意义。尽管很多作家强调个人性，但是他们所投入的恰恰是一种经验不断被公共化的写作潮流，是对时代质地和个体生命的简化。在当下的很多战争叙事（当然也包括影视剧）中，我们读到（看到）的是越来越普遍的对世界的简化。事实上，文学应该是反抗简化和遗忘的，它的使命是照亮、守护生活世界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处在战争历史进程中的人们，除了那奋不顾身的生死一击，是否还有其他存在的方式和命运的安排？那些因为坚定地朝向生而必须承受的隐忍、担负、背叛，以及短暂的甜蜜幸福和长久的悲伤痛苦又该如何处置？还有那些刻骨铭心却又无法完整的乱世爱情又该如何收场？凡此种种，那些或鲜为人知、或习焉不察的隐秘情感，都被僵化的历史观念和简化的叙事伦理忽略和遮蔽掉了。

战争历史不仅是一条汪洋大河，更是一个复杂的水系、一个辽阔的流域。我们往往只是注意到河流的最终走向，却对那些或汇入或溢出主河道的细小支流视而不见。在张庆国的《老鹰之歌》中，那些参与并见证战争进程的小人物，在历史的缝隙中左右支绌，拼尽全力、默默承受、遍体鳞伤。张庆国试图打捞起那些关乎个体命运也牵系国族历史的记忆碎片，用凌厉高蹈且饱蘸诗意的华丽语言，拼接编织出一个充斥着含混与哲思，新鲜饱满、元气淋漓的生命世界。傅汝新的《一塘莲》以解放战争为背景，讲述了辽南镇海寺的日常生活和卢氏三姐妹的命运沉浮；既有对战争进程及“准前线”的正面书写，也有对战场“后方”、同“生产”和“生活”相关联的农村、乡镇、城市市场的交叉叙述，还有对日常经验与情感纠葛的生动刻画；

通过对复杂人性的深刻挖掘与对地方生活质地的细腻表述，显露出诗性的审美风格。何鸿的《大西迁》展现了混沌历史的另一重面相，经过作者从案头到田野的细腻爬梳，历史真实与生活细节得以浮出水面。上海炼钢厂的铁血西迁之路，被主人公张辅枢一家人欣喜重逢的凄婉故事映衬得荡气回肠。窦棕的《全面击溃》沉入军旅现实生活的深度经验与内在肌理，打破过往英雄成长的叙事套路，在对个体军人形象的细腻刻画与镜像书写中，折射出新型高素质军人的内在品质与时代新质。

“新高地军旅文学丛书”第一辑的四部小说，并不属于世界之大，而是勉力写出了世界之小。每个人物、每个生命都是一个独立完整的世界，都有自己的价值和意义。这些真实绽放的生命，在时代的长河里翻涌沉浮，最终或将隐遁无形。但是他们真真切切地存在过，热烈地爱过，不同寻常地生活过，为了心中的情感、价值、信仰奋斗过、搏杀过，他们的生命值得尊重和发现，他们的记忆碎片需要被重新打捞并缝合。

然而这种打捞与缝合对于处在历史彼岸的当下作家而言，是极难的。难的是创作主体要对散落在“历史化”阴影中的历史碎片进行充分发掘、有效提炼与整体概括；难的是要超越线性的历史观，让不同政治阵营中的人物在战争的极端情境和冲突中经受肉体、生活方式、价值判断、思想精神的互见与试炼；难的是创作主体基于现代性的写作伦理传递出对历史更加全面的理解、更为深切的体认，进而表呈出新的文学取向和气质；难的是在虚构叙事与历史真实的混沌关联中，建构具有存在感和思辨性的文学伦理，最终以文学的方式超越历史的偏狭和局限。

历史强调的往往是结果，即便有过程，也是概括性的。小说弥补的恰恰是历史所遗漏或遮蔽的那些更为鲜活的细节。它们往往是被革命历史大潮裹挟着，或者随波逐流，或者搏击潮头，是多面的人生与故事。它们依照自身的逻辑在“革命”中翻卷，历史的不确定性以及个体命运遭际的偶然性，有如一枚硬币的背面。以另一面的立场重新反思、阐释和建构错综复杂的历史，其中的可能性和意义价值将得到极大的深化和释放。



## ■关注

在整个文学图书出版市场，青年文学（这里的“文学”指传统的严肃文学或者纯文学）肯定不是份额最大的部分，但发现和扶持有潜力的青年作家，从来就是文学图书出版的题中应有之义。无论是出于文学公益心，还是行业惯例，青年文学出版板块一直不大不小地存在着。

2021年，传统的文艺类出版社和新兴的图书策划机构、工作室在青年文学出版方面确有不俗的表现——像孙频《以鸟兽之名》、李静睿《慎余堂》、陈思安《体内火焰》、朱宜《我是月亮》、三三《俄罗斯套娃》、王苏辛《马灵芝的前世今生》、黎玄《山魈考》残编》、路魁《角色X》、王陌书《幽灵备忘录》、辽京《晚婚》、王威廉《夜未来》、郭爽《月球》、吕晓宇《利马之梦》、杨啸《重走》、周恺《少年、胭脂和灵怪》、文珍《找钥匙》、杨好《男孩们》、李唐《菜市场里的老虎》、项静《清歌》、周婉京《新贵》、孙一圣《夜游神》《团圆总在离散前》、郑在欢《今夜通宵杀敌》、杜梨《孤山骑士》、东来《奇迹之年》、宋阿曼《啊朋友再见》、丁颜《烟雾集》、索南才让《荒原上》、孟小书《业余玩家》、刘汀《所有的风都向她们吹》、庞羽《白猫一闪》《野猪先生》等等。这个不完全书单综合考量了文学界和大众传媒的“注意到”，（最直观的“注意到”就是朋友圈转发的各种推介）且以“80后”作家，尤其是“85后”作家为主，没有包括诗集和传统意义的散文、随笔、报告文学，也没有包括不考虑市场和读者的形形色色的青年文学出版。

分析上面的青年文学出版版图，参与其中的有传统出版社，比如译林出版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四川文艺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花城出版社、山东画报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等等，但更多的是如后浪、文景、单读、99读书人、楚尘文化等小而专业的图书策划机构和工作室，后者最终的出版完成是要和正式出版社合作。除了新经典、读客、博集天卷、果麦、磨铁等致力畅销书的几家，绝大多数图书策划机构只能走小而专业的道路，在一线和成熟作家的市场争夺上明显处于劣势，故而往往会选择年轻作家和新文学生长点作为市场开发的方向。一定意义上，近年正是这些图书策划机构和工作室的介入，推动了当下的青年文学出版。

值得注意的是，上面这个书单也许作为青年文学写作和出版繁荣的证据比较勉强，甚至恰恰反而显示出当下青年文学出版的隐忧和危机。首先，虽然有后浪的说部、单读（部分延续理想国的青年文学出版板块）、中信社的春潮、译林社的现场文丛、江苏文艺社的新青年和北京十月文艺社的未来文学家等青年文学丛书和书系，但和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作家社的文学新星丛书、长江文艺社的跨世纪文丛等相比，无论是出版规模还是作家组成都不可同日而语。其次，青年文学出版也不像九十年代新生代作家和新世纪之初“80后”作家出场那样自觉地介入到文学现场，生产文学潮流和发微文学审美。再有，客观上当下年轻作家似乎普遍晚熟，像90年代江苏文艺社那样给30岁才出头的苏童、格非等作家出多卷本文集的盛景不再。其实，也许不是出版社不为，是很难选到类似当时苏童、格非等相当的作家和成熟文本。还能观察到更多，这份书单除了李静睿的《慎余堂》、杜梨的《孤山骑士》和周婉京的《新贵》、黎玄《山魈考》残编》、杨好的《男孩们》等可数的几部长篇小说，其余的都是中短篇小说，且一般是一段时期的存量卸载，缺少内在结构意义上一致性的主题。由此可见青年写作者的文学生命、耐力和能量普遍不够，日常的阅读和写作变得随意、暂时和权宜，满足于细小的发表、出版、获奖、排榜、选刊（选本）和资助等文学利益。

也许还应该注意，推动青年文学出版的编辑不少是文学青年或者青年写作者。当然需要依靠他们的眼光和情怀支撑青年文学出版，但一个时代文学新青年的发现和更新审美的发明仅仅靠这些理想和情怀的文学编辑是难以完成的，比如在文学批评学院化和学术制度化大背景下，中国现代文学的批评家介入青年文学出版的传统日渐式微，其结果是能够熟练运作和操纵大众传媒的出版人和作家往往成为新作家和新审美的定义者，进而文学批评家也只是给大众传媒背书。

## ■短评

## 书写乡村振兴的破局之人

——读沉洲报告文学《乡村造梦记》 □曾念长

文化创意产业策划人林正碌，来到闽东屏南县的偏僻山乡，开始了一个在他脑海里酝酿已久的古村复兴计划。这个计划分三步走：第一步，用艺术改造农民，使其文化转型；第二步，修缮老宅和建造公共空间，营造适宜人居的山水人文环境；第三步，引入一批热爱乡村的外来艺术家入驻，带动本地外出人口回流，最终复兴古村。这是一座崭新的乡村振兴理念和实验，极有章法，逻辑也相当顺畅。我们首先看到，林正碌实有过人之处。他做乡村振兴实验，先从人的要素入手，只有人的要素活起来，乡村才有可能真正获得新的生命力。只是以往经验告诉我们，改造一个人，未必就比改造一块石头容易一些。20世纪上半叶，一批精英知识分子搞乡村建设实验，一度尝试在教育层面上提振人的因素，最后却成效甚微。林正碌则提出了一个似乎更加难以操作的思路——从艺术教育入手，让广大农民都成为艺术家。这个有点脑洞大开了。若不是眼见为实，几乎不可思议。大凡识得艺术奥秘的人，大概都会承认，艺术对人的改造可能带来脱胎换骨的效果。问题是，一个人的艺术能力是很难确认的。它关乎天赋，关乎夜以继日的苦练，还得考虑很多偶然性因素在起作用。林正碌想让农民都来学画画，人人成为艺术家，这一想法有多大的可行性呢？

《乡村造梦记》长达38万字，主线按照林正碌的古村复兴计划三步走来展开，其中有一半篇幅用来讲述第一步的实施过程，就是告诉人们，林正碌如何让农民朋友们爱上了画画。单从阅读体验来说，这一半篇幅并不是最理想的。只有当我们读到后半篇幅，也就是讲述农村空间改造和外来艺术家入驻，我们才体验到流畅的阅读快感。读完全书会明白作者把一半篇幅用来讲述乡村艺术教育的缓慢进展，是极其必要的，就像我们看欧美文艺片，人物陆续出场，线索慢慢交织，显得极其漫长，却是必要的铺垫。回到林正碌开展的古村复兴计划中来，如果第一步不成功，艺术教育不能有效改造农民，人的因素无

法得到激活，那么作为主人的村民就不会打开以传统农业经济为基础的封闭性空间，就不可能把外地艺术家引入农村社区，参与更大规模的古村复兴实验。正是在这条逻辑链上，我们意识到，古村复兴计划的第一步是至关重要的。《乡村造梦记》把一半篇幅放在这里，也就不难理解了。

只是我们难免还有些好奇，人人都是艺术家，这怎么可能实现呢？通过这个作品的叙述，我们可以在林正碌的艺术教育理念中直接获得一些答案。林正碌认为，艺术创作是一种自证性实践。也就是说，从事艺术创作，可以让一个人发现自己，确认自己，从而获得强大的人生信念。这种理念可以从艺术基本原理中得到支持。艺术具有自我认知功能，自证性也就意味着冷暖自知，所谓得失寸心间，所谓妙手偶得之，均是无法为外人道的。既如此，艺术如何变得可教育、进而成为一项社会工程的重要推动力呢？这里其实需要一个超出教育话题本身的具有更高视野的理论来解释。温铁军为这本书作序，其中提到一个观点，他说，后现代美学就是要打破工业时代的标准制式，让万物回到野性状态。工业社会讲标准化，产品标准化生产，人也是标准化培养。但是后工业社会把这种标准打碎了，一切回到天命率性的自然状态，这也就意味着，人人都可以成为艺术家了。如果我们了解风起云涌的后现代主义艺术思潮就会明白，林正碌的乡村艺术教育实验也是这个潮流的一部分，从历史逻辑来看，是有大时代背景作支撑的。在《乡村造梦记》里，作家沉洲反复提到了这个大时代背景。他将林正碌的理念和做法，甚至将整个屏南县的乡村振兴实验放在当代历史进程中考察，提出了一个时代性命题——要让乡村复活，要实现国家乡村振兴战略，不仅要破农业时代的局，更要破工业时代的局。

说到这里，我以为很有必要把这本书的序文和正文对照着读。前者从归纳性逻辑，因此高度概括；后者从演绎性逻辑，因

此充分展开。二者虽有不同，却又共享着某种重要的文本属性。这种文本属性呈现出这样一种特征：问题意识清晰，结论也是明确的。20世纪以来，全球范围内出现了两种具有特定内涵的纪实性文体。一种是产生于美国六十年代的非虚构小说，其代表性文本有《冷血》《夜幕下的大军》等；一种是产生于中国革命年代的报告文学，代表性作品有《谁是最可爱的人》《哥德巴赫猜想》等。表面上，这两种文体的写作均有新闻属性和实证属性，但其内在文本精神，却是天差地别的。非虚构小说以复杂现实探索复杂人性，而中国的报告文学则以人性力量来驾驭复杂现实。当这种单纯的理性力量被描述出来时，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处于升华状态的理想信念。在《乡村造梦记》中，林正碌就是一个有着坚定理想信念的乡村振兴实验者。他满脑子奇思妙想，并且发展出一套完备的理念体系，但是当把想法和理念付诸实践时，万念归一，万法归宗，显示出了超越常人的专注和无法抵挡的热情。从理想信念到复杂现实，中间有一个认知上的鸿沟，等待作者将其填补起来。这时候报告文学具有的文体特性就发挥其功能了。

一般认为，报告文学有三大特性：新闻性、文学性和政论性。前两个特性自不必说，但是少了第三个特性，报告文学作为一种特定内涵的文体就无法成立了。作家沉洲抓住了这种文体特性，将林正碌的个人气质和行动转化为一个可被概念和逻辑把握住的外部世界问题。这时候，个人的理想信念连接到国家乡村振兴战略，个人实践则成为乡村振兴战略在摸索中不断被验证的一个生动注脚。在个人微观层面，我们看到的是行动和故事。在国家宏观层面，我们看到的则是政策和理论。二者的联结正是作者启用的夹叙夹议手法。以我个人之见，这个作品最大的亮点不是叙，而是议。在我们读完一半篇幅，确认了人人都可以成为艺术家的逻辑起点之后，在接下来的阅读中我们可以鲜明地感受到，议论开始呈现出排山倒海的力量。

## ■第一感受

## 以一人之身心行走中华古典文明

——读憨仲《天高齐风》 □张丽军

齐文化的发祥地淄博是一片文学和文化的热土。古有辉煌齐文化，近现代有蒲松龄等文学大师，当代有宗利华、杜立明、郝炜华、魏孝孝等中青年作家。当读到皇皇六卷的《天高齐风》系列作品，我对齐文化故地作者憨仲的敬佩之心油然而生：这是一个人，以一己之力、一人之心去体悟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去做这个文化的探源者、回望者、呈现者。

从憨仲，我想到了和齐鲁文化有关的伏生。伏生以一人之力，冒着被杀头的危险，把中国古代的典籍藏起来，阻止了中国文化断层的危险。《尚书》等典籍因伏生的义举被后人重新发现。这种文化的传承者、守护者是非常让人尊敬的。憨仲以10年时间，用270多万字写出这一个人看到的中华古典文明史，这同样非常让人敬佩。

《天高齐风》有很多值得肯定的特点。第一是叙事质朴。憨仲以非常质朴的、自然的叙述方式，把坦诚的内心呈现给读者，具有绘事后素之美。第二是文气充沛。作者以一种很强的生命之气来灌注里边的人物形象。憨仲对每一个历史事件、文化人物的呈现，饱含着深厚情感。第三是有魂灵的书写。历史遗迹、文化和名人的背后，体现着道义和魂灵。憨仲对历史文化人物书写的文字背后，体现了中华文明那种涵盖千古的道义、情感，甚至是魂灵的东西。憨仲亲自一一去查看历史遗迹，并把这一过程做实录般的书写，其目的是想把古文明遗迹呈现给我们，要把历史的灰尘去掉，把它擦亮，给今天的人们提供一种来自历史维度的召唤和引领。这才是憨仲最深的用意所在。第四是史料性和实践性价值。我是莒县人，但是对于古老的莒国历史依然是知之甚少。书里边提到滕县一个叫茅焦的大臣给齐王劝谏，不看不知道，但看了就不会忘记。即使我们在高校里做文化研究的人，真要把这一个个地方的文明遗迹及其历史人物呈现出来，却很难——这真的需要行走万里的实践勇气。

《天高齐风》呈现一种大文化情怀的民间立场。憨仲以一人之力、个体之力去探索这个民族几千年的历史和文明，这种民间立场、民间情怀，特别动人。《天高齐风》为我们提供可见可观可感可想的，属于一个人的、独自支撑的中华文明回溯之旅。憨仲是用实地现场文化考察的方式，把被千年时间所淹没的、遮蔽的关乎民族文化核心与命运的历史大事、历史人物及其

魂灵，呈现给我们。这让我想到另一个人物——做历史学研究很有影响力的女性学者王选。王选是浙江人，做日军731细菌部队的受害者的访谈。王选用一人之力，去采访浙江一个个细菌战受害者，给他们建立个人档案，让历史有温度、有情怀、有个体、有生命，让日本人心服口服。这就是民间视域的独特意义和价值：真实个体的进入，真切的情感，更带有一种新历史主义的角度。礼失求诸野。五千年华夏历史，但我们的历史到底是什么样的形态？有哪些重要的人物？有哪些重要的遗迹？历史面目的清晰，恰恰是通过憨仲这样的民间人士去探寻，来不断架构它的丰富性、广阔性、地域性。

今天，我们正处于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时刻，憨仲的探寻和书写，更凸显出独特的精神价值和历史文化意义。《天高齐风》让我们们的历史讲述更真实、更可信。历史不仅仅是一个个的数字、人物，更应该让这些数字、人物复活起来，与我们对话，走进当代人的心坎去。历史不应该是一个个被遮蔽的、荒芜的古典遗迹，而应该是鲜活、有生命、有情感、有魂灵的存在。但真正让历史走进今天人的心目中，特别需要像憨仲这样的有伟大历史文化情怀的民间人士。这种古典文化溯源行动，不仅对民族历史文化极为重要，而且对于一个地方历史、地方文化有着重要的历史建构、文化滋养和精神培育功能。事实上，今天很多地方有着众多憨仲一样默默无闻的、为地方文化、为民族文化默默奉献的人。他们有着不可替代的地域性价值，具有更久更长的滋润一方水土功能，更需要成为我们关注的焦点。在民族文化复兴的关键时期，我们需要更多憨仲这样的民间文化人士去探索、建构，书写华夏古典文明遗迹。

对于憨仲著作的后期编辑和传播，我有几个建议。第一要重视文采，要把自然的风景和文化的风景做有机交融；第二推进书的跨媒介传播，书可做一多媒介、多媒介的呈现：地方标志性的文明遗迹、历史人物、民俗以彩色呈现、做访谈录音等，让它更生动，更具有可读性；第三可做“中华古典文明遗迹路线图”的简缩本出版。《天齐高风》要发挥更大的文化功能，让中小學生去看，发挥出对中华文明进行探究、回望、溯源的精神价值。从中，我们就可看到华夏古典文明的发祥、演变、传承，可以让今天的孩子对中华文明史可见、可感、可玩、可攀、可思，可行于清晰的中华古典文明遗迹路线上。

## 当下青年文学的出版版图

□何平